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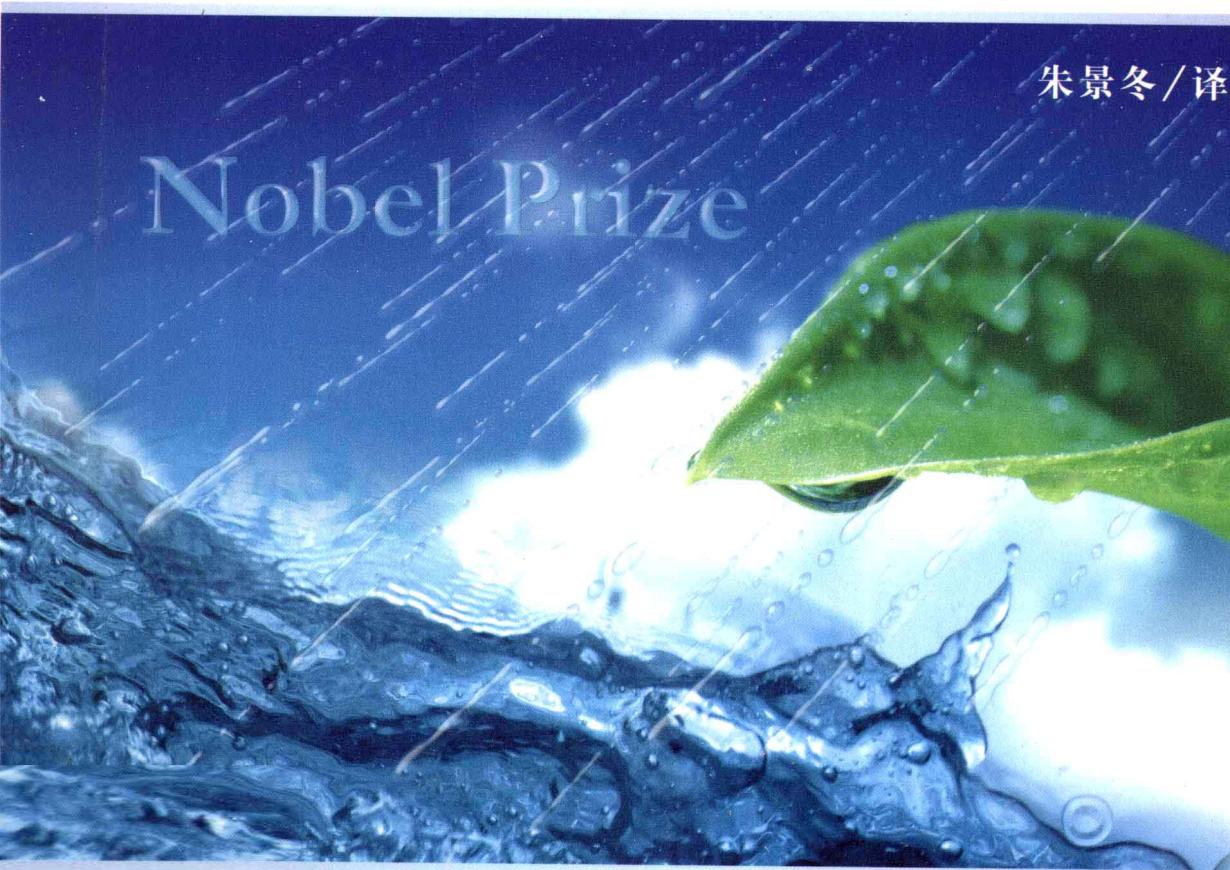
诺贝尔奖的幽灵

马尔克斯散文精选

上

朱景冬/译

Nobel Priz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诺贝尔奖的幽灵

马尔克斯散文精选

上

朱景冬 / 译

Nobel Prize



书名：诺贝尔奖的幽灵
作者：马尔克斯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 / (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著；朱景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109-420-9

I. 诺… II. ①马… ②朱… III. 散文—作品集—哥伦比亚—现代
IV. I77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730 号

诺贝尔奖的幽灵·上

出版人 和 瓣

作 者 朱景冬

责任编辑 吴海涛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93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目 录

世态万象

拉帕斯小溪	3
遭破坏的大自然	5
从巴黎，怀着爱	6
为一桩不愉快的事件画句号	10
达摩克利斯剑的灾难	16
瘫痪的城市	21
一所新大学的诞生和运转	24
邮递员千呼万唤	28
你可以吻她的手	33
首先要创造发明者	34
让法国的孩子喝牛奶	36
什么都可能	38
马戏团的驴子	39
十七个中毒的英国人	41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	53



八月的鬼怪	69
最后的宣言	72
鲜为人知的城市	75

往事回眸

缺水的加拉加斯	79
为讲故事而生活	81
震撼委内瑞拉的 72 小时	101
马尔维纳斯，一年后	104
拜访教皇	107
他干什么都像作画	112
拉丁美洲的孤独	114
埃里奥特和毕加索	119
不受罪的文学课	121
人们如何对待咖啡降价问题	125
我的文学修养	130
建设一个繁荣而公正的国家	138
269 人空难丧生	145

古今轶事

爱情的威力	151
孤独的家庭主妇	152
2 阿拉卡塔卡的虎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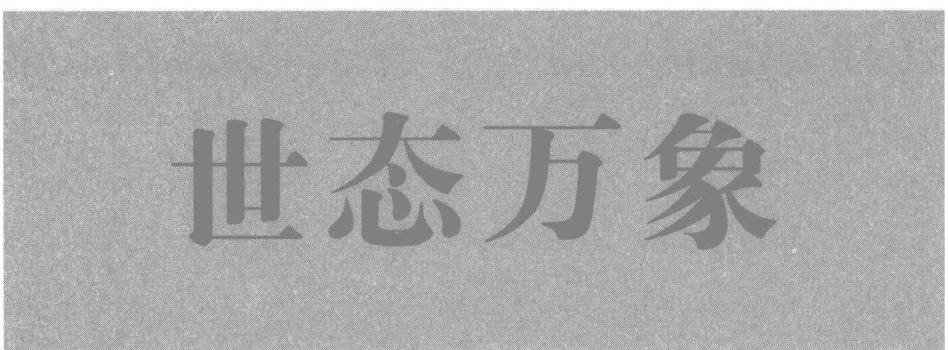


诺贝尔奖的幽灵

目 录

圣女	155
诺贝尔奖的幽灵	169
陆地上的遇难者	172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180
用帽子写的历史	182

诺 贝 尔 奖 的 幽 灵



世态万象



拉帕斯小溪

当巴兰基利亚下瓢泼大雨的时候——这是形容下雨的一种说法，因为巴兰基利亚经常下瓢泼大雨——谁也不知道马格达莱纳河到哪里结束，城市从哪里开始。就像在开天辟地以前那样，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冬天的大地是和洪水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古老问题，因为惟一的出路是修建下水道工程。在巴兰基利亚，那么多届政府做过那么多事情，却没有一届政府找到修建下水道工程的办法。

巴兰基利亚的倾盆大雨是城市的人们喜欢谈的事情之一。倘若找到了解决办法，多年前在这座大西洋城逢到下雨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在目前这种仍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的情况下，每年人们都谈论巴兰基利亚大街上奔流的小溪，仿佛这是新闻。一条古老的、总在重复、总是新鲜的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说，那些小溪是巴兰基利亚的季节之一：它们每年都出现，人们每年都怀着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热情谈论它们，就像欧洲人从多少个世纪之前就开始谈论春天一样。

比如拉帕斯街的小溪，是最准时最汹涌的，它构成了巴兰基利亚民俗学的主要部分。人们怀着那不勒斯人谈论维苏威那样的爱国激情亲切地叫它“拉帕斯小溪”。从这条小溪产生了把长木板从街这边搭到街那边、由儿童经营的行业：雨后，傍晚下班的行人每天交 5 分钱可以踏着木板过拉帕斯大街。因为在巴兰基利亚，下午经常下雨，也许创造了小溪的大自然故意这样安排的，好让这一切变得像春天一般美丽。



近年间，严肃的先生们曾严肃地考虑无论花多少钱也要修建下水道工程的问题。但是现在办成了另一件事情：架桥，架设城市的过街天桥，这样，无需解决那个问题就可以过街了。可以认为，这是国家的力量强似个人的创造性，强似搭木板让所有的巴兰基利亚人包括省长过大街的儿童行业的表现。因为在这座大西洋城市，没有一位省长下班后能够不过拉帕斯小溪而回家的。

现在，问题不用解决就解决了。愿拉帕斯和你们同在。



遭破坏的大自然

似乎一切都表明，创造得那么细致，那么精确，那么富有诗意的大自然，已经进入一个毫无秩序的混乱时期。

在西班牙，漫长而可怕的干旱正在造成一种极端严重的局面。在哥伦比亚，情况却相反，由于无情的暴雨连续不停，雨水达到我们的脖子，洪水泛滥，房倒屋塌，各种不幸不断发生。

对我们这些能够非常荣幸地亲自感受过春天的人来说，有时在街头偶然遇见有阳光的那些可怜瞬间，觉得它们真有点神奇的诗意。我们一直往前走，直到在波哥大街道上看见像《米兰的奇迹》中出现的那种凄楚的场面：一群被冻坏的流浪汉在争夺一线阳光，仿佛那是一件宝贝。比如在两天前，只有半个小时有阳光，但那是一个好天。也许，如果城市的那半个小时温暖的阳光早一点预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各公园挤满了临时和暂时避暑的人排队晒太阳的情景，因为似乎离排队晒太阳的那一天不很远了，就像现在人们为了坐公共汽车（也许以同样的票价）而排队一样。

这就是一切：大自然被搅乱了。也许这是一次热核试验的后果。对这种试验的真正影响，科学家们还不能预料和确定。由于这种试验，西班牙没有了小麦，因为已经很久不下雨了。而在哥伦比亚，尤其在波哥大，我们真希望有人能创办一家幻想商店，人们能在那里购买5分钱的阳光。



从巴黎，怀着爱

1955年12月间的一个冰冷之夜，我第一次来到巴黎。我乘火车从罗马到达一个装饰着圣诞灯火的车站。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成双成对在各个地方接吻的恋人。在火车上、地铁里、咖啡馆和电梯里，战后的第一代青年以其全部精力投入了爱情的公共消费。在灾难过去之后，这是他们享受到的惟一快乐。他们在当街亲吻，不在乎是不是妨碍街上的行人。行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不瞧他们也不理会他们，就像我们村镇的野狗，公的和母的挂在一起，在广场上生崽。情人们那么平静的接吻，在罗马——我生活过的第一个欧洲城市——可不多见，当然在雾气濛濛的波哥大也不多见，即使在卧室里亲吻也不方便。

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黑暗岁月。在街角的手风琴发出的怀乡乐曲声中，在街头糖炒栗子的香味后边，白色恐怖像贪得无厌的幽灵一般肆虐。突然，警察封锁了圣米歇尔街一家咖啡馆或酒吧的出口，推推搡搡地带走了所有不像基督徒的人。在劫难逃，其中有一个是我。无需多解释：不仅是面孔，而且讲法语的语调，都是招来不幸的因素。我第一次被投进圣日尔曼·德·普雷斯警察局关着阿尔及利亚人的牢笼里，我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是拉丁美洲人的偏见：认为受到监禁是一种耻辱，因为小时候我们不明确政治问题和一般问题之间的区别，思想保守的父辈负责教育我们，使得我们分不清是非。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既然他们认为我是阿尔及利亚人而把我抓了起来，关进了牢笼，当他们发现我虽然有一副上门推销布匹人的面孔却一点儿也



不懂他们的阿拉伯语时也不会相信我。但是无论阿尔及利亚人还是我，我们仍然是夜间警察局的如此频繁的光顾者，最后我们终于彼此沟通了。一天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对我说，为了成为无辜的囚徒，最好先做个有罪的囚徒，他让我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工作。他是阿迈德·特夫瓦尔医生，那个时期他是我在巴黎的老朋友之一，但是他在他的祖国独立之后去世，并非死于战争。

25年之后，当我在阿尔及尔参加那次的周年纪念活动时，我对一位记者讲过一件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阿尔及利亚革命是我唯一为之坐牢的革命。

然而，那时的巴黎并非只是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巴黎，也是长期以来拉丁美洲人最普遍的流亡地。确实，胡安·多明戈·庇隆——当时的他和后来岁月中的他不同——统治阿根廷，奥德里亚将军统治秘鲁，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统治哥伦比亚，佩雷斯·希门内斯将军统治委内瑞拉，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统治尼加拉瓜，拉法埃尔·莱奥尼达斯·特鲁希略将军统治圣多明戈，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统治古巴。同时执政的家长那么多，我们流亡的人也那么多，诗人尼古拉斯·纪廉每天清晨都出现在居热斯街大圣歇尔饭店他的寓所阳台上，用西班牙语宣布他刚刚在报上读到的拉丁美洲的新闻。一天清晨他叫道：“一个家伙垮台了。”垮台的当然只有一个，但是我们都怀着幻想醒来，但愿垮台的是自己国家的那一个。

来到巴黎时，我不过是一个幼稚的“加勒比”。对巴黎，我有那么多久远的恩怨，也怀有那么多更为久远的爱情。我最感激这座城市的是它给我指出了拉丁美洲的某种新的、坚定的前景。在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获得的总体概念，在巴黎的一张咖啡桌周围却变得一清二楚，让你终于明白，尽管我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船员。只要到圣日尔曼·德·普里斯街上顾客盈门的小咖啡馆



走一遭，就能够游遍整个大陆，遇到本国遭难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有的尚未到欧洲，比如胡利奥·科塔萨尔——从那时起我就钦佩他的美丽的《动物故事》——我在奥尔德·纳维几乎等了他一年，那里的人告诉我，科塔萨尔经常去那里。大约 15 年后，我终于在巴黎见到了他，他仍然像我多年来想像的那样：一个世界上最高的人，从来也不让自己衰老。他和他笔下的那个令人难忘的拉丁美洲人一模一样：在他的一篇描写另一个天空的故事中，那个人物喜欢在雾气浓重的清早去刑场看杀人。

布拉森斯的歌声随风飘荡。美丽的塔奇亚·金塔娜——一位勇敢的巴斯克女性，各地的拉丁美洲人都把她变成了我们的流亡者——奇迹般地用酒精炉为 10 个人做了一顿鲜美的西班牙菜饭。保尔·库洛德，我们的另一位皈依天主教的法国人，为那种生活取了一个名字：黄金般的贫困 (*La miseredorée*)。直到一天晚上我突然来到卢森堡公园，整天连一个栗子也没吃，也没有地方过夜，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在街上转悠了很久，希望遇见一支巡逻队，把我和阿拉伯人一起带走，投进暖和的笼子里睡觉。但是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天亮时，塞纳河边的高楼大厦开始在浓雾中露出轮廓，于是我向城里走去，双脚迈着坚定的大步，脸上显露着刚刚起身去工厂上班的诚实工人的面容。跨越圣米歇尔桥时，我觉得不是我独自一人在雾中，因为我听见迎面走来的人的清晰的脚步声。我看不见他那笼罩在雾中的身影，他在和我同一边的人行道上用同样的步调走路。我在近处看到了他那件红黑格的外套。我们在桥中央擦身而过的一瞬间，我看不见他那乱糟糟的头发，土耳其人的胡髭，饿得过久、睡眠不足而显得憔悴的面容，我看不见他那双充满泪水的眼睛。我的心顿时像冰一般冷，因为那个人就像刚刚归来的我自己。

这便是我对那些岁月的最深切的记忆。现在，我从斯德哥尔摩回



到巴黎，全力以赴地进行了回忆。从那时至今，巴黎没有变化。

当 1968 年我在好奇心驱使下想看看神奇的五月爆炸后发生了什么时，我发现恋人们不在公共场合接吻了，街上重新铺上了大方砖。墙上写的最美丽的标语：“想像与权力。沙滩在地下。你们一些人的爱胜过其他人。”已涂掉。昨天，走遍曾经属于我的地方后，我才感觉到一种新变化：城市的一些身穿绿色服装的男人骑着绿色的摩托车，带着几只考察恒星的机械手，沿街捡拾百万只狗每 24 小时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排出的粪便。



为一桩不愉快的事件画句号

从打我记事起，我从没有为书面的赞语致过谢，也没有为报刊上的中伤恼过火。这是公平的：当一个人由于其作品和其行为——像我做的那样——受到公众关注时，读者应该有特权说出他们所想的东西，哪怕是很糟糕的想法。所以很久以前我就放弃了反驳和纠正的权利——应该视为人的权利之一——并且从那时起在任何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一次也没有回答过人们针对我的任何辱骂，尤其是在哥伦比亚。

现在我不得不允许自己破一次例，以便评论政府为了解释上星期我不应该离开哥伦比亚一事而使用的两个理由。各位官员以各种口吻和形式就两个具体罪名达成了一致。一个罪名是，我离开哥伦比亚，是为了让我即将出版的作品引起更大的宣传效应；另一个罪名是，我那么做，是为了支持某种国际运动，损害国家的威信。两个罪名既相互矛盾，又十分荒谬，不能不令人气愤地问：是不是真的有人能够用面前的两个手指操纵我们命运的方向盘。

我一生知道的惟一巨大的不幸是宣传对人的扼杀。和我应该得到的东西相反，这使我命中注定像一名逃亡者一样生活。我从没有出席过公众活动，也不曾参加过群众集会；我没有作过什么报告，我从没有参加也不想参加一本书的发行式，我像害怕坐飞机一样非常害怕麦克风和电视摄影机，新闻记者们都清楚，我接受采访是因为我如此尊重他们的职业，我没有勇气对他们说不行。



不把自己变成公众关注的对象的决定，使我赢得了惟一无价的乐趣：保护我的私生活。在一切时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公众把巨大的责任放在我身上，我便总是处在觉得“我就是我”的惟一气氛中：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我的最大贡献不是写了我的作品，而是维护了我的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帮助梅塞德斯养育好我们的孩子。我的最大快乐不是得到那么多极好的新朋友，而是迎着最强烈的风保持住了最老的朋友们的感情。我从没有食过言，从没有泄露过让我保守的秘密，也没有不用打字机挣过一分钱。我有清楚而坚定的政治信念，并且把它建立在我自己的现实观念上，我一向把它讲给众人听，让希望了解的人知道。我几乎经历过世界上的一切。从被法国警察拘留和唾骂——他们把我当成反叛的阿尔及利亚人——到我和胡安·保罗教皇二世被关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因为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不动了。从在巴黎吃垃圾箱里的残羹剩饭，到在罗马睡在堂阿尔丰索八世死前睡的床上。但是，无论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成熟的年纪，我都从来不敢狂妄地忘记我不过是阿拉卡塔卡的电报报务员的16个儿子中的一个。其他的一切：我的人品、我的文学命运和我的诚实的政治态度，都源自对我的出身的忠实。

我曾说过，一切荣誉都要回报，一切资助都要奉还，一切邀请都要回敬。所以在我的交际中我一直非常小心。除了我的可靠的朋友的午餐外，别人的午餐我从不接受。许多年前我从事电影评论工作、准时去看电影时，总是把招待券留下以证明我没有使用，而自己买票入场。我不接受付过费用的旅行邀请。

上星期飞往墨西哥的机票，尽管墨西哥驻哥伦比亚的女大使有礼貌地表示反对，我们还是自己掏钱购买了。几天前，一位乐于助人的朋友没有和我商量就请求波哥大市长派人改换我家的配电时间表，以便和我的工作时间一致，此外，我还有一间没有自然光的书房和一台